

# 序言

· 徐兰君

## “亚洲视角”： “南洋儿童”的建构和战后新马地区的华文儿童期刊

近年来新马地区的华语文学及文化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但对本地的华语儿童文化及期刊的研究则还相对比较缺乏。成长于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一代，尤其是当时的儿童在阅读什么直接关系到接下来半个多世纪本地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影响直至今天。这是本论文集的重要研究意义之一。同时，研究战后到七十年代的儿童文化也是因为这个时期是新马地区印刷出版文化比较繁荣的时期，这从当时丰富多元的儿童读物和期刊可见一斑。当然，研究这些新马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儿童期刊，不只是追溯作为“读者群”的儿童，更重要的是，在本论文集中，我们试图强调“儿童”是一个历史和文化建构的概念。如果我们同法国学者菲利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sup>1</sup>一样把“儿童”这个概念历史化，将之放置于战后新马的历史语境之中，考察其发展的

---

<sup>1</sup> [法国] 菲利浦·阿利埃斯：《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沈坚，朱晓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历史脉络，一个关键性问题就呈现出来：“儿童”作为一个有效的历史和文化概念如何有助于我们理解战后新马地区的社会和政治想象？其与战后新马地区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兴起、反殖民话语以及海外华人社会国家与族群认同等重要课题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当我们把新马文学及文化中的儿童问题不仅放在“儿童文学”的范畴里，而且将之放在整个亚洲区域的华语文学文化发展的语境中来讨论时，它又将呈现出怎样新的研究意义？

柄谷行人在他的《现代日本文学的起源》一书中提出，“所谓孩子不是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一个方法论上的概念。”<sup>2</sup>正是在这种方法论的眼光之下，孩子才成为可观察的对象。儿童的发现与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之间的联系通常是学者切入儿童问题时关注的一个重点。当我们用现代国家民族的观念来对社会群体重组时，国家的概念与每一个个体建立起一种抽象性的关联。在这一关联中，儿童概念的产生，就是一系列从具体到抽象，从经验到理性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的儿童话语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国家话语成功地自然化、合理化的概念之一。斯特凡·田中 (Stefan Tanaka) 在其文章《童年：发展话语在日本空间里的自然化 (Childhood: Naturalization of Development into a Japanese Space)》<sup>3</sup> 一开头就指出作为重要隐喻及象征的儿童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作者认为，儿童已经成为现代暧昧性和冲突性合为整体的一个拟人化场域。也就是说，一方面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把儿童的自然发展抽象化了，将儿童的发展与基础教育和现代国家福利制度的发展等联系在一起；同时，儿童自然生理上的发展又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论述中一个很重要和

<sup>2</sup> 柄谷行人：《现代日本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版，页124。

<sup>3</sup> Stefan Tanaka, “Childhood: Naturalization of Development into a Japanese Space”, *Cultures of Scholarship*, edited by S.C. Humphrey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pp. 21-56.

经常被引用的隐喻，即用儿童从不成熟到成熟的生理发展历程来解释现代民族国家的发生发展的抽象过程，使之直观化和自然化。虽然田中所讨论的是日本语境下儿童话题的发展过程，但对研究战后新马地区的儿童话语也很有启发性，也会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的廖冰凌教授在分析新马战后的本土期刊《马来亚少年》时提出：虽然这个时期的华人对“国”的向往还是中国，但“家”是在马来亚。她把《马来亚少年》期刊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认为“从创刊号至1947年间的内容来看，此初阶段的文化糅合概念包容性最强，它兼容了英殖民政府的声音、中国原乡的认同情感，以及南洋范畴的本土意识。”<sup>4</sup> 在教科书研究方面，叶钟玲和黄佟葆合编的论文集《新马印华校教科书发展回顾》通过对1965年前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印尼三地教科书的比较来追溯三地区华文教育发展的轨迹。其中崔贵强的论文《从“中国化”到“马来亚化”——新加坡华文教科书的嬗变(1946-1965)》分析了战后新加坡华文教科书沿革史，提纲挈领地讨论了教科书“马来亚化”的过程。如作者所说，“战前新加坡的华文教育，构成了中国教育的一环，其行政、学制与课程，都是以中国的为典范。至于其教科书，除了三十年代后期有本地编印与出版的少数教科书外，其他都是中国进口的。”<sup>5</sup> 而在《方吴报告书》出台以后，本地的华校课本被要求改编和进入“马来亚化”。当然，如何看待这个时期“马来亚化”和在当时引起华社怎样的讨论需要谨慎对待和仔细辨析。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Félix Bourdieu, 1930-2002)所提出的场域(field)理论对我们分析战后新马地区的儿童刊物与当时的历史

---

<sup>4</sup> 廖冰凌和伍燕翎：〈多元共生的想像：《马来亚少年》与战后马来亚华人的儿童观〉，《哲学与文化》（2013）第四十卷第二期，页33。

<sup>5</sup> 崔贵强：〈从“中国化”到“马来亚化”——新加坡华文教科书的嬗变(1946-1965)〉，见叶钟玲和黄佟葆合编《新马印华校教科书发展回顾》（华裔馆，2005），页68。

政治权力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具有参考意义。他试图在场域系统中把社会结构与复杂的情感心理相互结合而超越文本内外的一种对立。所谓的场域，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空间，是各种因素与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很多‘选择’都是双重行为，既是美学的又是政治的，既是内部的又是外部的。<sup>6</sup> 本论文集的不少论文都是把这些儿童期刊还原到历史情境中，考察其与当时历史政治变迁之间的呼应关系。整个亚洲华语地区的五六十年代可以说是个人和国家都遭遇“聚散离合”的时期。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在2013年8月日本爱知大学与神户大学在名古屋举办的题为“大分裂时代的叙事——大陆·香港·台湾·马来半岛”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曾作如下的讲述：

分裂带来主权及主体的异动，地理和心理的震荡。由此产生壁垒分明的史观，裂痕处处的“说法”，暗示意义系统的重新洗牌。更重要的，这些作家多半在战争期间亲历种种颠仆，即使在文本层次，他们的作品见证生命体验与传记/传奇的繁复切换。到底怎么诉说战争，见证分裂？在战争叙事的另一面，是叙事战争。<sup>7</sup>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文化冷战也渗透到当时的儿童刊物中，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冷战思维如何改变了这个大分裂时代不同地区华语儿童刊物对未来理想公民的建构以及社会“发展”话语的形成？有学者用“天真的武器 (innocent weapons)”来形容冷战时期儿童对两大阵营的重要意义。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更多的是对情感和意识 (hearts and minds) 的一种争夺，所以家庭和学校成了两大阵营进行意识形态争夺的主要场所。学

<sup>6</sup> 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页248。

<sup>7</sup> 王德威：《战争叙事与叙事战争：延安，金门，及其以外》，《“大分裂时代的叙事”会议论文集》，页13。转引自袁一丹：《打通历史的关节（1937-1952——“聚散离合的文学时代”会议侧记），《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第219页。

者在比较了美国和前苏联冷战时期有关儿童的宣传政策后发现，虽属于不同的阵营，苏联和美国在冷战政策思维上却呈现出许多相似性。<sup>8</sup> 如果说在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动员是希望儿童能实际地参与战争，那么在冷战时期，所谓的战争动员更多地不是以军事训练的方式呈现，而是通过教育以及保持社会日常秩序稳定的责任。<sup>9</sup> 也就是说，儿童通常成为建构和定义冷战时期社会日常行为标准和统一规范的有效工具之一。<sup>10</sup> 当时，两大阵营的成员通常以己方儿童有受对方意识形态侵蚀之危险来凸显儿童思想教育管理之重要性。这些现象在这个时期出版的各种儿童刊物中都有体现。必须要指出的是，这本论文集大多数论文主要讨论“南洋儿童”的建构，同时也有涉及“少年”的部分，如《马来亚少年》、《世界少年》以及《少年乐园》。

当然，这些对“南洋儿童”的发现和建构多来自于成人编者或作者。其中发行这些儿童刊物的书局负责人引起了较多的讨论。《马来亚少年》是战后马来亚发行的首份本土华文儿童刊物。南洋书局的负责人陈育崧和刊物的早期主编许云樵已经有学者专门讨论<sup>11</sup>，对他们在儿童读物出版方面的贡献也有所涉及。章星虹以《南洋杂志》和《马来亚少年》报为考察对象勾勒出战后初期的许云樵如何普及南洋研究。自1931年开始，许云樵曾在南洋数间中学任教，执着于南洋研究，特别是史地部分。章星虹的文章比较有洞见地察觉到儿童和少年的刊物成为许云樵这样“南洋研究学人”普及南洋知识的有效途径：“在《马来亚少年》里，主编许云樵对版面栏目的编排、读物类别的筛选、主编读者之间的互动，体现出‘把马来亚 / 南洋带入普通人的视野’

---

<sup>8</sup> Margaret Peacock, *Innocent Weapons: The Soviet and American Politics of Childhood in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4, p. 2.

<sup>9</sup> Ibid. 3.

<sup>10</sup> Ibid. 4.

<sup>11</sup> 廖文辉：《许云樵评传》，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4年。

这一编辑方向。”<sup>12</sup> 她特别强调了许云樵的多个身份：中学教师、写作人、南来知识分子、非科班出身的学人和远离政治的文化人。这样的投射使作者对《马来亚少年》的研究超越了“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的研究范围，考察这份以青少年为读者群的刊物如何成为许云樵向社会大众启蒙和普及“南洋知识”的有力媒介。南洋书局由教育界与史学界名人陈育崧创办。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儿童期刊的编辑多是一群处于无名状态的以集体编撰者出现的作者或编者。尽管这部分资料十分缺乏，此书中的不少论文尝试通过口述采访或者细读期刊的资料尽可能地呈现他们的信息。曾是世界书局职员杨善才先生介绍说《世界儿童》当年的编辑班子多是一群旅居印度尼西亚，从中国南来的文化人，其中不少是华文教师。不论是《世界少年》还是在陈凌子论文中所揭示的亚洲出版社的难民作家赵滋藩，他们中的不少人是由于政治原因离散到香港和东南亚地区的南来作家及文人。他们参与到儿童刊物的编辑有谋生的需求，同时也有他们对自己的“家”和“国”的情怀和忧思。

除了将儿童与现代民族国家话语联系在一起，另一个更值得注意的研究角度是在区域的范围内以比较的视野来分析同一个时期不同地区的儿童话语之发展的异同。这样的研究角度能打开地理视界，扩充中文文学的空间坐标。在离散和一统之间，华语文学及文化已经铭刻复杂的族群迁徙、政治动荡的经验，难以用简单的地理诗学来涵盖。宋怡明(Michael Szonyi)在研究冷战时期金门的日常生活时，特别强调了军事化、地理政治学、现代化以及记忆四因素的重要作用<sup>13</sup>。同样的特点也呈现在本论文集所研

<sup>12</sup> 章星虹：〈战后初期的许云樵：搭建南洋研究的普及平台〉，何启良编，《百年寻绎：马新历史人物研究》，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2012年，页105-134。

<sup>13</sup> Michael Szonyi,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l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究的五六十年的华语儿童刊物中。通过比较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等地流行的儿童刊物，可以比较深入地探析这个时期亚洲区域内不同意识形态华语儿童文化在建构未来理想公民以及社会“发展”(development)话语等方面的异同。我们要把这个时期不同华语地区的儿童成长历史互相连接，将之呈现为一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开放状态。虽然在战前或者说即使到五十年代，新马地区的儿童读物很多都来自上海，但是我们还要尽量避免将之简单化成一种由上海(中国)一个中心点向外扩散的过程。尤其是在五六十年代，由于社会政治的变迁，这些地区的儿童出版文化之间的联系我更希望理解成为杜赞奇所提出的无中心(或者多中心)的网状结构。这里也许可以用他的“流动诸历史”(circulatory histories)这一核心概念来进一步理解这种亚洲区域内部出版文化产业的网状发展结构。正如他试图用此概念揭示的：“历史不是某单个群体或组织的专属物……一个社群的历史不管好还是坏事都是由不同范围的借用循环式的联系和外力在交叉互动中形成的。”<sup>14</sup>而这种联系可以在地区、国家或者全球性的场域中同时进行。同时，在他看来，流动可以朝着不同的方向运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甚至可以返回原位。也就是说，传播和扩散不仅仅是单方向和线性的，是一种分享的历史。这样的流动通常依赖不同性质的传播网络得以完成，例如跨区域的出版发行网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跨越边界的传播活动可能会产生新型的文学、文化类型和相互的结合。<sup>15</sup>

在五六十年代，本地的重要书局包括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南洋书局、世界书局和上海书局。如果仔细考察这五家书局在这个时期的出版目录、儿童期刊、青少年读物、教科书以及课

---

<sup>14</sup> Prasenjit Duara, *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 Asian Traditions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53–54.

<sup>15</sup> Ibid. 242.

外读物是其重要的出版物类型。由儿童刊物及教科书的出版切入战后新马地区的书局历史和出版历史是了解华语语系文学文化生成的重要一环。虽然新马本地书局的历史由于材料缺乏等原因一直无法充分展开，但近年来，这些书局负责人的后人开始写一些回忆性或者学术性的文章，提供了不少一手资料，如上海书局的陈蒙志先生，写了一些非常有参考价值的文章，为之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论是上海书局的老板陈岳书还是世界书局的周星衢先生，早年的事业都与上海密切关联，但随着时局的改变以及在新马和香港等地图书业版图的扩展，他们的事业逐渐以东南亚地区为中心，建立了可观的出版与分销网络。

以上海书局为例，它创设于1925年，并于1947年开设香港上海书局，由贩卖书刊转而进入出版阶段。1948年印行现代小学课本，供应各地华校，从1957年开始出版巫文课本和英文课本，供各源流语文学学校使用。在地理迁移上，从上海到新马再到香港，在事业版图上，从华文书店经营转向出版与发行本版图书，在语言上，从华语走向多语言出版，呈现出本地书局身份的转变历史与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变迁息息相关。事实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讨论的是新加坡——香港的两城书缘与当时亚洲区域内部的冷战政治之间的关系。在接下来的这个部分，我将结合相关书局的历史，从儿童刊物出版的角度进一步讨论“华语语系文化”在冷战时期的离散路径。这些儿童刊物名称中的“南洋”和“世界”等概念、跨国的出版网络和读者互动、以及相互呼应的栏目及主题的设置都在提醒我们冷战氛围下两大阵营文化出版之间模糊的界限以及超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小朋友》杂志的多种变身：1949年以后，在新中国语境下继续发展的《小朋友》杂志，还有在香港地区经过改版的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小朋友》杂志，以及在东南亚地区发行的《南洋儿童》。



## 三个不同版本的《小朋友》杂志：上海－香港－南洋

### 1) 新中国与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小朋友》

在五六十年代的新中国，儿童杂志出版种类众多，其中历史最悠久的当属《小朋友》杂志<sup>16</sup>。1922年中华书局在上海创办《小朋友》杂志，第一任主编是黎锦晖（在任时间，1922-1926年）。由于战争爆发，这份儿童期刊曾经在1937年10月28日以后一度停刊。美国学者安德鲁·琼斯在他的专著《发展的童话：发展话语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sup>17</sup>中专门开设一个章节讨论进化论思维在本杂志的封面设计中如何借儿童与动物的关系呈现出来。其实早在他的第一本专著《黄色音乐》<sup>18</sup>，他已经讨论到《小朋友》杂志的创始人黎锦晖和他创办《小朋友》杂志的启蒙初衷。目前对《小朋友》杂志的研究多是集中在1937年以前。我比较关注的则是这份刊物在1949年前后的一种转变和在香港及东南亚地区的多种变身，借此来探讨华语文化的一种离散路径。五十年代，东亚地缘政治发生剧变，中国在一九四九年大分裂成共产中国、民国台湾、以及殖民地香港与澳门两岸四地。在香港这个连接地带，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儿童刊物在这里并存，而英殖民政府尽量采取一种中立的态度。当然，所谓的左右阵营并不是一种截然对立的关系，相互之间充满各种模糊及暧昧的关系。《小朋友》杂志本身多种版本并存这个事实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个特点。

早在三十年代，受抗战影响，《小朋友》期刊上发表了不少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作品。在1953年初，《小朋友》脱离中华书

<sup>16</sup> 吴芳芳在她的硕士论文《小朋友1927-1937》（2010年）中对《小朋友》的创刊及早期阶段的发展作了比较详尽的梳理。

<sup>17</sup> Andrew F. Jones, *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 Evolutionary Thinking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sup>18</sup> Andrew F. Jones, *Yellow Music: Media Culture 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 the Chinese Jazz Ag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局，改由新成立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内容与版式方面又与以前大有不同。1953年-1956年间，黄衣清任主编，办刊宗旨为：

“通过文艺形式，结合课堂教育，培养幼儿一代的道德品质，并丰富他们各方面的知识。”1956年，鲁兵任主编，结合社会发展需求提倡“通过生动有趣的艺术形式”启迪儿童智慧，培养乐观主义精神，进而达到共产主义目的。<sup>19</sup> 五十年代的《小朋友》刊物，由于受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不少的封面与内容文字都渗透了战争逻辑和军事化思维。例如1001期的封面是一群小孩在舞龙灯，在最前面领导的孩子举着的是美国将领的头，舞龙的躯干上面则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八个大字，从而把儿童游戏与政治宣传结合起来。

除了游戏经常成为承载儿童生活或儿童读物中革命意识和阶级斗争思想的媒介以外，在六十年代《小朋友》的刊物封面里，“火箭”是这个时期不能忽略的意象，它成为当时国家建设力求“多快好省”的整体政治氛围的重要象征。1960年的《小朋友》开设了“小火箭”专栏，几乎期期都有，多放在首页，有着“喜报式”的宣传特征。此专栏的标志性符号是一儿童穿着宇航服坐在火箭上的形象，而专栏各期的内容就是这一坐在火箭上的男孩穿梭在国家建设的各个现代化场景之下，呈现的主要是经济发展领域的成就。“火箭”栏目除了介绍当时新中国的主要建设成就以外，还会跨国旅行，从而自然地带出当时国际政治格局中不同意识形态体系下的儿童生活。例如1958年第10期的“小火箭”栏目就是小火箭人拜访非洲国家、法国、美国以及日本等地所观察到儿童生活图景。这里所用的叙事修辞是典型的冷战时期的二元对立结构：共产主义国家里儿童生活美好幸福而非共产主义国家制度下儿童则过着悲惨的生活，从而确立前者社会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在这组图画系列里，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儿童的地位

<sup>19</sup> 同上，页70。

和作用。在这里，苏联儿童并没有出现，而中国儿童充当着给非洲地区儿童带去革命经验的引领角色。这样的角色设计显然与当时中苏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也许我们可以把“火箭”阐释为大跃进运动的政治背景下新中国期待高速化发展所必有的时间及速度的象征，但是当儿童的身体被捆绑在象征高科技的火箭之上，结果之一却可能是儿童个体的意义被消融在国家话语之中。<sup>20</sup>更重要的是，借用这个火箭上儿童的眼光所呈现出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奇景处在童话与现实的暧昧关系中。

## 2) 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小朋友》和《儿童乐园》

如我们上面所提到的，新中国成立后，《小朋友》刊物由中华书局合并到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年1月，中华书局广州办事处所编的《小朋友》半月刊海外版在香港创刊，内容以文字为主，黑白印刷，并远销新马等地。<sup>21</sup>根据中华书局1953年大事记，此海外版《小朋友》半月刊印销量增至一万以上，比较受欢迎，正如《小朋友复刊的颂歌》中所写，“三十多年历史，久到今天，复刊重见面，好内容，丰富且轻松，多写意，样样都具备。但愿今后小朋友，利益普及全地球。”<sup>22</sup>虽然我们没有足够的材料确定中华书局发行《小朋友》杂志到底是商业考量居多，还是对香港与东南亚的冷战格局之直接回应，但不同版本之《小朋友》的出现是受当时冷战思维影响的。香港学者郑树森谈及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学时，就曾明确地指出：

<sup>20</sup> 这一论点是研究生课上的学生聂雅莉、姜果均和赵卉心在其作业报告中的有趣观察。

<sup>21</sup> 根据《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1953年1月，广州办事处编《小朋友》半月刊海外版在香港创刊。同年2月，中华书局编辑所原有少儿读物及有关编校人员，连同《小朋友》半月刊一并转移到新建的少年儿童出版社。编审陈伯吹参加了该社的筹备工作。具体见中华书局编辑部：《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页260。

<sup>22</sup> 《小朋友复刊的颂歌》，《小朋友》1953年6月第8期，页1。

南来作家左右对垒，很快就卷入当时美苏两大霸权的冷战对峙……1956年4月《青年乐园》创刊，争取《中国学生周报》同年齡层读者。1959年4月创刊的《小朋友》，应是要和《儿童乐园》‘对着干’。<sup>23</sup>

1949新中国成立后，香港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开始进行调整与改造。他们面对的一个重要难题是如何在香港继续立足生存：“两地经济结算体系迥异，花费大批外汇勉强支撑终不是长远之计。‘一厂两制’遂应运而生。它的意思是容许港厂采取适度宽松的业务政策，承接外来商业订单，使厂务得以继续。”<sup>24</sup> 香港中华书局“一厂两制”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香港版《小朋友》存在的理由。

1953年，曹聚仁曾在《南洋商报》发文讨论五十年代初期香港受政治格局影响的文化出版事业。在他看来，这样多种意识形态并存的香港促使出版界各显神通。他也提及了当时刚刚出版发行的香港版《小朋友》，“内容绝对以启发智慧为主，不带前进政府意味。”<sup>25</sup> 他认为，这是新中国政府对中华书局采取了不同于中国大陆的指导方针，让其能在香港独立经营。

与少年儿童出版社发行的《小朋友》相比，在香港出版的这版《小朋友》杂志内容上多是以道德教育为主，其中的栏目“品德修养”也通常列在最前面。在《一九五四年本刊编辑计划》一文<sup>26</sup>中，编者指出读者来信普遍表示喜欢“品德修养”、“问题讨论”、“童话诗”和“自然科学知识”中的生物世界、“历史

<sup>23</sup> 郑树森：《遗忘的历史，历史的遗忘——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学》，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主编《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2。

<sup>24</sup> 庄玉惜：《印刷的故事：中华商务的历史与传承》，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10年版，页165。

<sup>25</sup> 曹聚仁：《香港的文化战线》，《南洋商报》1953年5月7日，页3。

<sup>26</sup> 小朋友编辑部：《一九五四年本刊编辑计划》，《小朋友》1953年第21期，页15。

知识”以及“兰姐姐信箱”等栏目。编辑部将之定义为“这一类有关小朋友自己切身需要的，理论与真实的作品，”是深为“将来人类社会主人”的小读者所热切希望懂得的知识。也就是说，这个版本的《小朋友》刊物以儿童本位以及培养“人类社会主人”这样具有普世价值的目标作为自我定位。这样的中间立场似乎是身处香港那样的冷战中心地带比较现实的一种市场策略。举个例子，叶沃若经常在这份期刊上发表富有道德教育意义的童话诗。其中有一首诗歌的题目是《让他们宁静地睡觉》：

在他们宁静的睡眠中，我希望，不要吓惊了他，不要  
拍枱拍杆的争吵，不要面红耳赤的执拗，不要喊打喊杀，  
不要放枪放炮。让我们的弟弟妹妹，在我们的世界里，宁  
静地睡觉。让他们醒来的时候，感到生活的幸福，欢笑快  
乐，不要悲哀痛苦，涕泪交流。<sup>27</sup>

诗歌的配图是两个小孩抱着玩具安然酣睡在一个布置优雅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卧室里，传达出亲情之美好。与此类似主题的还有一首题为《让我们和睦相处》的诗，内容讲的是一条街巷里各个家庭的小朋友如何友好相处，最后作者呼吁道：“在这条街巷里，从来没有争吵，我们人与人相处，多么和睦，喜气洋洋，但愿整个世界，都跟我们一样。”<sup>28</sup>从内容上来看，许多诗歌主要是提倡小孩子之间互助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如《运用我们的力量》等等。杂志还经常组织一些大范围的讨论，包括“我长大了做什么工作？”以及“和怎么样的人做朋友”等主题，面向小读者召集稿件，创造一种互动的氛围，并在这种引导性的讨论中完成道德思想上的灌输及教育。

<sup>27</sup> 叶沃若：《让他们宁静地睡觉》，《小朋友》1955年10月第64期，页23-24。

<sup>28</sup> 叶沃若：《让我们和睦相处》，《小朋友》（香港版）1953年12月第20期，页20-21。

香港版《小朋友》的封面多是儿童的日常生活照片。这样的选择也避免了比较直接的政治意识形态灌输。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份杂志完全没有政治意识形态倾向。在内容和材料的选择上，与香港其他同时期的杂志相比，与国内相关的内容所占的比例相对较高。其中有以科普知识为名介绍新中国石油的出产分布情况，借“地理知识”的栏目介绍黄河的水利情况，“民丰物盛的珠江”、“肥沃美好的黑龙江”以及“富强有力的松花江”。另外还有不少文字内容直接表达对祖国的思乡之情。例如《祖国颂》一诗歌就直接传达此类情感：“祖国！祖国！你是我们的故乡，地广人多，物产千万样。可爱的祖国啊！我愿回到你的怀抱，接受你那慈爱的抚养。”<sup>29</sup> 而叶沃若的《我是一中国孩子》一诗表达更为直接：“我始终是/从头发到脚趾是/一个中国的孩子。”<sup>30</sup> 1959年3月15日出版的第147期是最后一期，之后刊物进行了改版。关于改版的确切原因，由于材料的缺乏，我们很难知道，但如果结合《小朋友》所刊登的这些内容和香港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很有可能的一种原因是其越来越明显的左倾内容；从它后来改版成彩色画报来看，此版的《小朋友》文字过多，黑白的版面设计很难与当时市场正盛行的由友联出版社发行的儿童画报《儿童乐园》竞争。

此份《小朋友》杂志的读者不仅面向香港，同时也企图争取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和马来亚的读者。也许为了配合南洋地区的读者，不少内容的安排都很有地域特色。例如第九期就有题为《马来亚的动物》的文章介绍南洋地区的动物种类。在不少期数的封底，有栏目“朋友们”，上面多是小读者的照片，其中不少

<sup>29</sup> 《祖国颂》，《小朋友》（香港版）1956年10月的第88期，第27页。另外1956年第90期则刊登有题为《梦境》的诗歌：“昨夜里，我作了一个梦，梦见了我多年阔别的祖国……四周远远近近都林立了工厂，机器的转动声震耳欲聋，人们都滴着汗、唱着歌，在建设着他们自己的家园。”

<sup>30</sup> 叶沃若：《我是一中国孩子》，1956年10月的第89期，页23-24。

相片的主人来自新加坡和马来亚。1958年10月22日，英殖民政府禁止中国四十三间书局及香港十间书局的图书进口新加坡，认为这些刊物可能会妨碍“效忠马来亚的进展”。<sup>31</sup> 在被禁名单中，中国青年出版社、儿童读物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少年儿童出版社等主要从事青少年儿童教育读物的出版社都赫然在列。其实在之前的一年，马来亚联合政府已经发出类似的禁令，香港版《小朋友》刊物因而无法在马来亚销售。新加坡殖民档案也显示这些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出版的儿童刊物引起了当地书籍检查处的注意。现存新加坡档案馆的一份报告（1953年）中，有如下记载：“在中国和香港有越来越多的以儿童或青少年为主要对象的刊物出版。总的来说，印刷质量不错，图片也很吸引人，可是故事通常会激发马克思主义思想，不过还不至于构成足够的理由禁止它们入境。”

针对这样的一系列禁止法令，1959年春，香港中华书局在港借“小朋友画报社”的名义，“以小学低年级学生为对象，增用大量彩图与连环画，于四月出版《小朋友画报》；在南洋，《小朋友画报》易名《南洋儿童》，以‘南洋儿童出版社’名义主销东南亚各地”<sup>32</sup>。其形式与内容跟《儿童乐园》非常类似，许多栏目可以说是直接的搬用，主要以图画为主，全刊彩色印刷。这样的一种改变和模仿可以说是冷战局势和市场需求双重压力下的一种调整，而《南洋儿童》的不少栏目则是直接搬用《小朋友画报》，例如《小强的故事》这一专栏。

<sup>31</sup> 〈防弥颠覆宣传·扑灭色情文化政府援引不良刊物法令禁止共产中国及香港五十三家出版物输星〉，《南洋商报》1958年10月23日，页5。

<sup>32</sup> 霍玉英：《五十年代华文儿童杂志的足迹》，《世界儿童·童心永远》，新加坡：大众控股有限公司2004年版，页23。

表一、《儿童乐园》、《小朋友画报》和《南洋儿童》栏目比较

儿童乐园	播音台	小圆圆	宝宝游记	民间故事	历史故事	科学知识	动物故事	生活故事	伟人故事	图画小习作	寓言	童话
小朋友画报	彩色电视	小强的故事	小朋友游记	民间传说	历史故事	科学知识	动物故事	生活故事	人物故事	小朋友画室	寓言	长篇连载童话
南洋儿童	彩色电视	小强的故事	小朋友游记	民间故事	历史图画故事	不定期	动物故事	生活故事		益智故事画	寓言	长篇连载童话

《儿童乐园》于1953年由香港的友联出版社创刊出版，至1994年停刊，共出版了1007期。创刊号开篇就是题为《新加坡的孤儿市：大家选举出市长，自己来管理自己》的文章。一份在香港出版的儿童刊物，为什么开篇讲述的是新加坡的故事？无独有偶，第三期“歌曲”一栏中出现署名为徐晋的《南洋歌》。另外，第九期上的《神秘之岛》<sup>33</sup>，配搭着完整的南洋地图，这些都彰显着此刊物对南洋市场的企图。从刊物所列出的代理经销商的版图来看，其销售网络也是遍布东南亚各个重要国家及城市，甚至远销到日本东京和美国芝加哥。可以说，这是一份被跨国儿童群体所广泛阅读的杂志。那么连接如此广泛的儿童群体共享阅读兴趣的主要意识形态话语是什么。

谈起友联出版社的政治背景，曾是友联出版社社长的王健武先生将之定义为“第三势力”，在当时的香港属于政治上的中间派。这样的一种政治选择也使得《儿童乐园》的定位从总体上来说意识形态的倾向性比较模糊，<sup>34</sup>另据为友联服务多年的林悦恒先生回忆，“‘友联’是政治性比较强的团体，它的政治主张是：

<sup>33</sup> 徐晋：《神秘之岛》，《儿童乐园》1953年第9期，页14-15。

<sup>34</sup> 卢伟銮、熊志琴编著：《香港文化众声道》（第一册），香港：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14年版，页148-149。



民主政治、公平经济、自由文化，这是它基本的信念。我们觉得在香港进行工作，教育是很重要的，故此希望在不同的阶层进行工作，所以有《儿童乐园》、《周报》、《大学生活》、《祖国》周刊，这些杂志的出版时间先后不是相差很远，大家觉得这几个层面都必须包括在内。”<sup>35</sup>

友联出版社在某段时期曾受到美国亚洲基金会 (Asia Foundation) 的财政支持，因而杂志有些时候难免会有亲美倾向。亚洲基金会作为美国冷战的重要组织，在亚洲有选择性地支持符合其自由民主理念的文化机构，所以刊物在传达的理念上也有不少与此相关。也正因如此，尽管《儿童乐园》保持一定的中间性，但其政治认同还是会不时地有所流露。例如，在《各国的国旗》为题的一组漫画中，<sup>36</sup> 中国一栏下所列举的是当时台湾国民政府的旗帜，其政治倾向性不言而喻。另外有一期直接刊登题为《台湾好》的配图诗，诗歌夸台湾的风光好、农产好、土产好以及建设好。”<sup>37</sup>

另外，创刊号中包括了《自由歌》为标题的诗歌：

图画辞典里，什么字都有。最美丽的字，就是‘自由’。什么叫自由，大家来研究。想一想！小朋友，笼里鸟儿叫，网里鱼儿跳，叫不停，跳不停。自由不自由？再想想！小朋友，鸟儿空中飞，鱼儿水中游，来悠悠，去悠悠，自由不自由？<sup>38</sup>

诗歌对“自由”愿景的推举也呼应了当时友联出版社的政治追求。《自由歌》的配图的是一渔翁在海边打渔的恬淡景致。

<sup>35</sup> 卢伟銓、熊志琴编著：《香港文化众声道》（第一册），香港：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14年版，页181。

<sup>36</sup> 《各国的国旗》，《儿童乐园》1956年第92期，页13。

<sup>37</sup> 《儿童乐园》1959年第156期，页13-14。

<sup>38</sup> 《自由歌》，《儿童乐园》1953年，创刊号。

“自由”的理念与画中海里的鱼、远处航行的船以及空中飞翔的鸟等意象共同绘织出一幅与自然相关的理想图景。除了“自由”，和平是另一核心主题。在第十三期，徐晋发表了《和平之音》一诗<sup>39</sup>：

鼠——猫的眼中钉，生成没有友情。可是，可是我们的童话家，凭自己的心灵，描绘了另一个意境：猫儿提着弓，拉动大提琴，殷勤地招待鼠儿们；噙铃铃！噙铃铃！奏出和平之音，表示出友好的心。鼠儿们，静静聆听。只觉得和谐柔美，清新，忘掉了仇恨，恐惧，忧闷。

诗歌的配图是一只猫在拉小提琴，而围绕在它周围的是一群听得如痴如醉的小老鼠。而图的角落以不相称的比例描绘了缩小版的一只猫在追杀老鼠的情景。将素为天敌的猫和老鼠处理成如此和谐相处的美好图景，不难看出作者的良苦用心。

### 3) 南洋国家的独立与儿童杂志的在地化：《南洋儿童》和《世界儿童》

1952年发表在《南洋商报》上的题为《南洋教育文化的展望》<sup>40</sup>一文，提出了“建立此时此地的文化”的主张。这样的理想也体现在由当地中华书局出版的《南洋儿童》中。早在1923年，中华书局就已经在新加坡创设分局，并在同年十一月向新加坡政府注册，设址于新加坡大马路牛车水，1957年由星局出资重建三层新厦，首任经理是杨绍周先生，他不但经营学校课本与少数学校参考书，还兼营文具。中华书局新加坡分局的创设，对于大量中国及香港各地出版的图书在新加坡地区的传播，具有重要

<sup>39</sup> 徐晋：《和平之音》，《儿童乐园》1953年第11期，页14-15。

<sup>40</sup> 马俊武：《南洋教育文化的展望》，《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1952年10月27日，页9。

的意义。由于历史的原因，新加坡曾禁止过部分中国大陆出版物进入南洋，导致了以《小朋友》刊物为代表的、在南洋地区颇为流行的一批中国大陆出版的儿童杂志一时间无法进入该市场，因而香港印刷的《南洋儿童》就以《小朋友》的替代者身份进入南洋地区。

《南洋儿童》创刊于1959年4月25日。刊名中的“南洋”是一个地理名词，而其概念经过历史和时间的推展，有所改变和演化。许云樵在其《南洋史》指出南洋一词持有地理暧昧性，并“无严格之规定”，现今可作为“以华侨之中东南亚各地”。<sup>41</sup>“东南亚”一词是由英国首相邱吉尔在提议组成“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抵抗日军组织而浮现的军事用词。<sup>42</sup>李金生在其有关南洋概念的文章中，提出南洋的释义所历经的从“泛指”到“专指”、从“混淆”至受“认同”以及从“广泛应用”到“逐渐式微”的演进过程，而其最后的“萎缩”是因其渐被东南亚的概念取代。<sup>43</sup>这种改变，揭示的无疑是中国意识被淡化，而在地色彩愈发浓厚的历史演变过程。

的确，为了迎合东南亚的读者需求，《南洋儿童》呈现出一种比较强烈的马来亚意识。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其不少封面都与马来亚独立的政治事件相关。例如第41期，封面是一名马来亚男孩身穿典型的马来族服装，站在一辆汽车上向周围群众致敬，特别突出的是覆盖在车头上的马来亚国旗。这样的封面构图建立的是儿童与国家之间的一种直接联系。根据同期的正文介绍，这位男孩被称为“最勇敢的儿童”，他不顾个人生命安全在急流的河里救起落水的儿童，因而被马来亚联合邦最高元首授予勇敢奖章。

<sup>41</sup> 许云樵：《南洋史》，新加坡：世界书局1960年版，页2-3。

<sup>42</sup> Wells, Anne Sharp,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World War II: the war against Japan*,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1999, p. 248.

<sup>43</sup> 李金生：《一个南洋，各自界说：“南洋”概念的历史演变》，《亚洲文化》第30期（2006年6月），页113。

与此类似，第51期的封面上一名华族小男孩正欢快地骑着自行车穿越独立桥，独立桥正是为了庆祝马来亚独立而建立的一标志性建筑。封面将华族男孩与具有象征国家独立的象征符号并置，本身也预示了这些儿童未来国民身份的归属。如果联系到香港版的《小朋友》在马来亚禁售的问题，这样强烈的在地化倾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一种策略性地淡化中国意识的行销包装。当然在读者的接受层面，具有如此强烈马来亚色彩的杂志起了构建未来国民身份认同的作用。为儿童确立值得学习的模范，通常是一个国家开始逐步确立自身文化道德规范的核心部分之一。《南洋儿童》借助其封面的选择也有效地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

谈起华语儿童杂志的在地化，除了《儿童乐园》和《南洋儿童》，就不能不谈世界出版社发行的《世界儿童》这一在当时东南亚影响广泛的本地儿童杂志。世界出版社起源于周星衢1924年在新加坡创立的上海正兴公司，最初售卖从上海带去的年画和洋画。经过十年左右的苦心经营，他于1934年在新加坡创办世界书局，专营图书出版和分销，将标点书和以白话文书写的书籍带入南洋，并逐渐构建起连接东南亚一些主要城市的分销网络。随着东南亚政治时势的发展，周出于策略性的考虑，于1949年在香港成立的世界出版社则主要经营华文图书零售和杂志出版，主要供应香港和东南亚市场。在香港东南亚的出版网络中，儿童书籍和教科书的出版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世界书局曾经编印《南洋幼童文库》以介绍基本常识为出发点，内容分为历史故事、人物故事、民间故事、童话、寓言、语文常识、动物常识、矿物常识、科学常识、卫生常识及文娱游戏等十七类，共一百本。全书以图画为主，配上浅显的文字说明，适合新、马等地的小学一、二年级及就学前儿童阅读。<sup>44</sup>

<sup>44</sup> 王虹主编：《岁月如书：大众集团八十五周年特刊副刊》，新加坡：大众控股有限公司2009年版，页27。

1958年2月，在周星衢退休之前，他接受《南洋商报》的访问，谈话中他强调本地文化“需要马来亚化”是真正促进新马华文出版蓬勃发展的内因，并提到由于冷战格局造成当时中国出版物进入东南亚很难是外因。根据时任香港三联书店老板蓝真的回忆，英国殖民政府禁止被认为含“左派”倾向内容的中国图书进口，其时不论是对南洋图书市场还是香港都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周则“凭着敏锐的市场触觉，找蓝真合作，通过大量租借图书纸型这个独特的方法，将中国国内解放前出版的没有共产意识的书籍，包括文化、历史、地理和诗词曲赋类的内容，在香港印刷，再发行到包括新马的海外各地。因为当时香港的出版业非常薄弱，市场也有限，蓬勃发展的东南亚是所有香港出版社和书店迫切需要的海外窗口，其市场规模远远大于香港。”<sup>45</sup> 在蓝真看来，相对于新加坡的其他书局，世界书局的形象和立场相对中立，在五六十年的冷战格局中，这是对其自身发展比较有利的定位。

从以上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在儿童杂志的传播与发行当中，为了适应接受方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读者的需求，这些期刊的身份在持续地改变和多元化，“儿童”的意义也在不停地生成当中。如果最初在新中国语境下的《小朋友》杂志有一种鲜明和强烈的国族归属，但之后在香港和东南亚地区的改版则呈现出比较多元复杂的身份认同。这一个特点从这个时期的其他比较驳杂的儿童刊物名称可见一斑，例如“马来亚少年”、“世界儿童”、和“南洋儿童”等可以看出其不同的政治身份认同。无可否认，当时亚洲地区的冷战政治让这些儿童刊物成为各种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文化场域，“无辜 (innocent)”的儿童从而不再纯洁如白板一块。例如本论文集中王楠对香港儿童杂志《小朋友画报》

<sup>45</sup> 曹蓉：《东南亚华文的推手——记大众集团创始人周星衢先生》，《诗书滋味长：大众集团九十周年特刊》，新加坡：大众控股有限公司2014年版，页54。

与《儿童乐园》的比较研究，尤其通过对这两份政治意识形态倾向有所不同的刊物中的平行栏目——游记之比较分析，指出“儿童想像性的跨界旅行，其游览路径、观看模式，与他者互动过程等无不隐含某种意识形态。”可是也正如本论文集一些论文中所提出的，对市场及读者数量的考量使得书局和出版者又尽量地在内容选取上保持中立立场以淡化其政治色彩。陈凌子的论文则把“亚洲出版社”的少年儿童出版物放置在冷战香港的语境之下，重点分析“亚洲少年丛书”中的“科学故事”，比较深入地考察了“孩子——国族”的话语建构呈现出怎样的复杂样态。她尤其指出“南下香港的‘难民’知识分子这一独特的编写和出版团体所书写和生产的少儿知识读物也表现出独特的在地面貌。‘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国’的概念在亚洲出版社的少儿科学读物中显得格外的暧昧。”

### 关于本论文集

这本论文集是多年积累的成果，主要收录我近六年来指导的国大中文系学生写的与本地儿童文化相关的荣誉论文、硕士论文以及他们的课堂期末论文。来国大中文系任教后，出于对儿童文化研究的兴趣，我经常鼓励中文系的本科生与研究生关注本地的儿童期刊和儿童文化。从我2011年指导林燕纯同学研究《世界儿童》作为她荣誉论文的主题开始，先后指导了五位同学作本地华语儿童期刊的研究。当初这些学生没有太多的前人研究可以参考，一切从零开始，找资料就花费了不少苦功，通常是在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收集资料或者向本地的收藏家求助。我自己平时也经常周末去牛车水的跳蚤市场买相关的儿童杂志和本地出版的教科书等，与他们分享。即使找到了相关的期刊资料，更困难的是找到与这些期刊相关的书局、编辑人以及期刊出版过程的相关材料。可喜的是，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本地儿童期刊和儿童

读物开始数据化，为进一步研究华语地区的儿童文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例如在香港和东南亚地区伴随几代人成长的《儿童乐园》在有心人士的帮助下目前已经全部可以在线浏览。而2010年，世界书局也把《世界儿童》和《世界少年》的数码版权无偿捐赠给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目前一共389期的《世界儿童》已经上网并且在持续的更新当中，可以供公众和研究者免费阅览。

在2014年，我开设了一门研究生课，主要跟学生一起探讨儿童概念的变化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基于“儿童”是一种研究方法的理解，在构思期末作业时，我鼓励选课的学生利用在课堂上学习到的方法和思路去做本地五六十年代的儿童期刊及儿童读物的研究，例如《世界儿童》、《世界少年》、《儿童乐园》以及《南洋儿童》等。通过对儿童期刊的栏目设置、出版发行渠道、期刊背后的资金来源以及相关书局的历史的考证和挖掘，我希望学生不仅能对本地的儿童文化史有所熟悉，更重要的是也因此对本地的出版史和教育史有更加深入的理解。我一直坚信研究“南洋儿童”的形成历史，不只是探究本地儿童的成长史和阅读史，同时也是有效地切入华语语系文学及文化的一种方法和角度。

本论文集的论文在对新马儿童期刊的分析中呈现出以下一些主要观点：1) 新马儿童期刊和教科书如何有助于对国民意识的培养：其中之一是“马来亚意识”的形成：徐祯关于中英文版本《马来亚少年》的研究比较清楚地呈现出这个倾向。她对两个版本的《马来亚少年》进行了比较，并考察其“马来亚化”为主的政治意识基调，同时也分析这两个版本与英政府的密切关系；李志萍的《少年月刊》也是在同一阐释框架中来分析。除了期刊，教科书一直是公民意识建构的重要方式。李丽丹的两篇论文分别通过对六十年代新加坡建国后小学《公民》教科书以及七十年

代小学《生活教育》教科书的细读来分析新加坡儿童的国民意识建构。2) 超越民族国家倾向的区域意识：这一论点似乎与先前的结论有所矛盾，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五六十年代新马地区儿童期刊的重要特征之一。究其原因，则同这个地区在这个时期的政治环境以及跨国出版文化网络密切相关。吴鸿飞、林秀婷和林煜辉三人的论文通过对《世界少年》期刊中“史地教育”栏目的细读，提出“所谓力求‘中立’和‘去中国化’的做法，并非纯粹的因冷战的紧张局势逼迫而采取的被动行为，而是世界书局及《世少》编者在受到东南亚社会内部的发展与变化趋势的影响下，主动采取的编辑理念。”他们尤其注意到这个时期东南亚地区反殖民思潮的兴起，随之本土意识与国家意识开始强化，而为适应这样的社会变动，《世少》的编辑“试图将东南亚区域一体化，建构‘东南亚少年’，从而为推动东南亚摆脱殖民枷锁的进程作出了贡献。”这篇论文有趣地指出，“二次大战开启了东南亚对世界的关注，冷战也促使认识世界比认识中国，来得更为重要而且急迫。”由此，“自二战后，编者不再将自己局限在‘中国—南洋’这一中国中心的思维体系之中，一套崭新的世界认知体系正逐渐被东南亚华人接受。”而这一倾向被作者理解为《世少》“去中国化”的表现。其实这样的一种阐释和理解也许同样适用于对《世界儿童》的解读。曾麒霖通过分析1957年前的《世界儿童》，注意到这份杂志对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公民意识培养：“从创刊时公民意识塑造仍有着浓厚‘中国’气息逐步过渡为立足于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修身明德之本、以培养南洋区域意识为主导、着眼于了解世界各国风貌、增进知识兴趣的‘未来世界公民’。”

当然，这本论文集还有一些重要的主题因为种种原因没能有机会展开深入的讨论：1) 对这些儿童期刊的出版者以及编辑群体的研究，由于一手资料的缺乏，一直无法深入和清晰地展



开；2）这些儿童期刊在当时是如何被接受和阅读也暂时没法深入的了解。在这些儿童期刊中，例如《世界儿童》，不少期数的封底都有刊登各地读者的照片，并有年龄和地区的信息。这些资料固然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些期刊杂志的读者之地域分布以及年龄层次，但这些刊物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被具体地阅读则无法了解。正是基于这样的疑惑，李丽丹在杨善才先生的帮助下，采访了本地的文化人网雷和长谣两位先生。他们在五六十年代曾是这些期刊的读者。通过他们的回忆，我们得知当时许多读者是通过租书的方式阅读的。其中网雷先生也谈及《世界少年》是他的文学启蒙读物，对其写作帮助很大。类似的口述访谈也许还可以继续做下去。3）本论文集主要集中在儿童期刊与教科书，但五六十年代新马地区儿童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各个书局出版的种类繁多的儿童读物。对这些儿童读物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展开。此外新马地区的儿童游戏、儿童戏剧，以及儿童组织例如童子军在本地的落实等问题都可以在将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的讨论。

## 致谢

这本论文集能顺利出版，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在这本论文集中，我们采用了不少图片，非常感谢周星衢基金执行董事曹蓉女士、教育出版社的林玉玲总经理和《马来亚少年》的主编陈育崧的后人 Tan Tiong Hee 先生的大力支持，允许我们免费使用这些图片，让我们的研究成果能以图文并茂的生动方式与读者见面。

同时我要特别谢谢新华书局的老板杨善才先生这几年来对我及我的学生们在研究上的支持。近几年，我对本地的书局历史以及儿童出版文化非常感兴趣，但许多时候深感材料的缺失。每次向杨先生求助，他都热情帮忙，无私地分享他的收藏，并且联系介绍本地的文化人方便我进行口述访谈。我的学生每次论文碰到

材料方面的困难到他那里寻求帮助，也都是满载而归。另外，我也非常感谢上海书局陈蒙志先生的帮忙。我的学生李丽丹在做硕士论文时，陈先生就给了非常及时的帮助。这两年我在做上海书局的研究时也曾口述采访过陈先生，获益不浅。

关于本书的出版，我要特别谢谢八方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冯婉明女士。她的专业和耐心的态度使得这本论文集能以最好的面貌如期面世。此外，我尤其要感谢我的合作者李丽丹。她虽然曾是我的硕士生，但在了解本地教育文化方面要比我更深入。丽丹曾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有专业的教育学背景，并在国大中文系研究生期间撰写有关新加坡小学华文教科书的论文，特别难得的是在本地的小学华文教育领域有多年的实践经验，所以非常高兴这本论文集能与她合作，互相取长补短。丽丹在本书的选稿、编辑以及对本地文化人的访谈等各个方面都尽心尽力，付出了很多心血。

我也要谢谢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同事容世诚老师的支持和帮助。关注儿童期刊与冷战文化之间的关系受益于他的启发和提醒。另外，近几年来，国大中文图书馆一直在努力收集中国及新马本地的儿童期刊和读物以丰富我们的研究资源。中文图书馆的吴国涟小姐尤其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特此表示感谢。同时，我也谢谢我的博士生周思，在本论文集的校稿方面贡献良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目前正在撰写的博士论文也是与儿童话题相关，集中探讨八十年代中国的儿童话语与新启蒙文化之间的关系。

最后，我要谢谢本书各篇论文的写作者和在国大中文系上我的课的学生们。这几年来，除了指导荣誉论文和研究生的论文，我先后开设过与现代中国儿童文化相关的本科生及研究生课程，通过“儿童”这个有别于女性及其他成人群体的特殊视角去深入了解上个世纪中国的家庭结构、教育制度、白话文写作以及出版

文化等方面的变迁。教学相长一直是件幸福的事。老实说，研究战后时期新马地区的儿童期刊及其文化对我完全是一个新的领域。这几年在指导这些学生的论文以及上课的过程中，我学习到了很多，也得到了我很多启发。这个论文集只是一个开始。五年前，我编过另一本论文集《儿童的发现：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中的儿童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其中的参与者很多是我的老师，而这本论文集则收录的多是我的学生所写的论文。他们在国大中文系毕业后，多数还继续在本地的教育机构从事华文教育相关的工作，以身体力行的方式积极参与到本地儿童文化和教育的建设当中去。新马地区的儿童文化史及其相关的出版文化史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发展的研究领域，希望我和我的学生们，以及这个领域的其他同行在推动本地及其他地区的华语儿童文化研究方面能走得更远。